

生活并不在别处

应奇著



生活

并不在别处

应奇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生活并不在别处 / 应奇著. —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308-13076-9

I. ①生… II. ①应…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67803 号

生活并不在别处

应奇 著

责任编辑 杨苏晓

营销编辑 李嘉慧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制 作 北京百川东汇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46千

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版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3076-9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应奇，浙江诸暨人，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主编有《当代实践哲学译丛》、《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系列》、《哲学的转向：语言与实践译丛》、《共和译丛》、《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系列》、《文化与政治译丛》、《社会科学方法论：跨学科的理论与实践译丛》。

看了《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这篇文章，有一种感慨：我们将不得不对自己的言行慎之又慎，因为它们一定会在历史上留下踪迹的。

——童世骏

《北归端恐待来生》这篇有一种情怀，深切、浓郁却又静默悠远，弥足珍贵。未来世代的知识考据家，若是勘察我们这个“当代”，定会从此文中有所发现：“那时候”也不是每个读书人都垮掉了，“那时候”文心尚存，不过于冷僻处罢了。

——刘擎

潇洒自任，应氏风格。另外，你不说话，就没有人说话了，有点气节的人会寂寞至死的……你的文字其实是有深意的，不过，底线总在温柔敦厚处。

——韩水法

目 录

- 短篇小说之爱——代序 / 1 非原创的作家看起来八面玲珑，因为他们大量模仿别人，过去的，现在的。而原创艺术只能拷贝它自身。 / 1
- 生活并不在别处 / 10
- 超越所爱者，甚至被爱者——事毕半生三十年记——Vladimir Nabokov / 13
- 完美之困境，完美而有光烈之需求——记我的老师叶明生先生 / 123
- 理智的力量——叶青山《我的哲学》重订本跋 / 144
- 易遗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读《忆往》及其他 / 149
- 慷慨激昂之气，深沉郁勃之感——读《忆往》 / 153
- 我站在人群的外面——给曹卫方 / 166
- 印象、论调、语境——致“哈”群诸位 / 169
- 从林毓生到佩迪特——我与严耕涛的故事 / 179
- “反”“盟”“强”——在“法治”及其他 / 185
- 未来的主人公——在“我的朋友”给内蒙古教授讲座上的致辞 / 190
- 阿兰《论自由》的政治思想史意义——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演 / 193
- 康德、西学精英与联邦自由——甘阳《政治哲人伯特兰》书评 / 198

登小雅之堂

(代序)

我年轻时的“文学梦”和“科学梦”都不甚久：我的语文一直不错，从来都是课代表，用诸暨家乡方言“声情并茂”地朗诵朱自清的《荷塘月色》乃是我作为这个课代表的一项“特权”，但我从未梦想过成为“文学家”——我充其量设想过成为一个“新闻人”的可能性，因为“新闻学”和“考古学”乃是我认真地考虑过的两个文科专业，虽然我后来报考的是理科；我的数学也不赖，时常在各类竞赛中得奖，还在1984年那一套可能是有高考记录以来难度最高的数学卷子上考出了近七十分，但我也从未梦想过成为陈景润；我倒是梦想过成为“学者”，但应当也不是那种“大”到要出眼下这种“集子”的学者；我最终的同时也是未完成的身份乃是“哲学工作者”。我不知道要把“哲学家”这个名号的内涵缩小到什么程度，同时把它的外延放宽到什么程度，才能把我这样的“工作者”也包含在那个“家”中。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那就是我离一个“哲学翻译家”的距离肯定要比我离一个“哲学家”的距离近一些——如果不说近得多的话。

从一定意义上说，已经按照某种归类“集结”在这里的至少在表面上颇有参差的文字——它们的一个最主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是一个离“哲学家”还很远的“哲学工作者”和一个离“哲学翻译家”相对比较

近的“哲学翻译者”写的——都或者与翻译工作直接相关,或者就是在漫长的翻译生涯中用作休息的时间里,为了调剂自己日渐沉闷的情绪而敲出来的,有的(或者它们的“雏形”)甚至就是直接敲在作为自己的娱乐方式而给天各一方的朋友们所写的各类邮件中的——我给这些文字取的一个总名就是“我的部落格”。为此,我要感谢那些为了尊重他们就必须在这里“被匿名”的朋友,他们长年累月地忍受着我兴之所至和信马由缰的“骚扰”,虽然他们最常用的忍受方式就是沉默——他们显然比我更好地践行了维特根斯坦的箴言:“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我们就必须保持沉默。”但他们也许更善意地“忘记”了芝生冯友兰先生的教导:“人必须先说许多话然后保持沉默。”特别要感谢的是严搏非先生,他既是上述“朋友”这个大类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一个足够“另类”的成员,多年前他在看到我信笔写下的一则随记(我还记得这篇博文就是《天堂夜归》,虽然我那时还没有使用“我的部落格”这个总名)后就问过我有多少这类文字,他愿意帮我结集以让更多的朋友分享。大约是两个月前吧,看我的“部落格”“行情”随着朋友们受到“骚扰”的频度而更有些“看涨”,他又重申前议,颇愿做一件集始作和终成于一身的雅事。我必须在这里承认,他的这番盛情雅意对于我无疑是一种激励和鞭策,而这是因为,我虽然有时会自嘲并被嘲已经“堕落”到只能写写这类小品文抑或“部落格”,但却自揣仍然自觉肩负着崇高的翻译使命,并在多年前就设想过而且到现在也依然没有放弃自己更为宏伟的写作计划。就此而言,搏非的这个建议无疑是给了我一个“自行了断”或者至少是向“沉沦”于“部落格时代”的“我”告别的机会。当然我也必须说,在一个“诸神隐退”、“生灵涂炭”——这个词在这里的意思仅仅是个人的原子化或原子化的个人——的时代,这种“告别”是如此哀伤和艰难,至少并不十分令人畅快和感到容易,但为了已经日渐贫瘠和苍白的“自我”的重新成长和更大程度的充盈,这种告别又是——用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流行的小品中的词来说——必须的!

大约是去年七八月间吧,大概主要还是拜自己的这个无限接近于翻译家的“翻译工作者”的身份所赐,我应朋友之邀参加了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首届西方政治思想史高级讲习班”,并且忝为“讲师”。我

是掐着自己的“讲习”时间来到北京郊外蝉声沸腾中的昌平校区的，在为我“接风”的宴席上，一位朋友提到他刚在“哲学在线”上看到我的“迹近小品”的文字，并由衷地夸赞了几句，我在内心无比激动的同时还是强作低调，连称小作实难“登大雅之堂”。从这个角度，用“登小雅之堂”来定位这里的文字的性质，我自信倒确是虽不中亦不远的。虽然根据我浅薄的文史知识，《诗经·小雅》乃讥刺之作，而且至少从表面上看，这里的某些篇什也似乎确实不乏这种精神和趣味，但我仍然要正名并自我辩诬的是，从内在的层面，无论我自己，还是这里的文字，都也还是谨遵“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之诗教的；我也曾经自我调侃：“温柔敦厚”也许不及，“光风霁月”或有过之。在为我的“部落格”辩白时，我还曾有言：“这些文字也许并不是非得公开，但它们无疑具有可公开性”，现在想来，这种可公开性大概就是我所谓“光风霁月”之所指吧。

今年九月底的一天，我陪小女在曲院风荷荡舟，微风之下水平如镜，远山寂寂，一派清秋气象，在在不免引人秋思；回家在逛“古曲网”时就撞上了李祥霆先生演奏的《天净沙》一曲，当时就曾发给我的朋友们分享。我其时未便提及的是，我的“秋思”还有一个更重要或者说最重要的寄托对象就是已经在十年前的深秋离我而去的我的父亲。我的父亲是一名地质工作者，但在我心目中，他首先是一个热爱哲学的人，我最初接触到的哲学书就是他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在北京求学时在当时的东安市场买到的，例如笛卡尔的《哲学原理》、斯宾诺莎的《知性改进论》、黑格尔的《小逻辑》，当然还有列宁的《哲学笔记》；他基于自己的“政治经验”先是在1984年阻止我报考文科，后来又在我顺利地从理科脱颖而出上重点大学分数线之后，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上吉林大学的自然辩证法专业学习，并对我抱有很高的期望，我自然明白，他的这份期望中有一个重要因素当然就是他自己未能实现的“哲学梦”。父亲有很高的抱负和眼界，记得多年以后当我第一次在国内“层阶”最高的哲学刊物上发表文章——这篇文章题为《斯特劳森的哲学图像》——后，有一次在我刚装修好的小家，我拿出这篇文章给他看，他翻了翻，在流露出欣悦神色的同时，说了一句：“什么时候能够用自己的话写出有独立见解和思想的东西就好了。”我相信，从这样一个标准来衡量，他一定

是不满意于在那之后还“打拼”了这么些年的我的表现的。同时,父亲还具有非常好学的精神和相当强的学习能力,他也曾经学习过多种外语——这从我在他的藏书中发现的各类各语种的词典中就可以得知——并对俄语和英语具有较高的素养。毫无疑问,这种学习兴趣和能力都是我所不具备的。这样说来,对于我目前之差不多以翻译为业,就一定是出乎他的意料的了。但我曾想,如果我们(也包括一定已经在天堂的他)不要那么苛严地看待人类的理智活动,适当地放宽对于人类应当和能够去成就的事业的了解,我自我安慰——其实主要是为了安慰他——地认为,他对我事业上的成就或者所成就的事业应当也是可以满意的吧。

1984年9月中的一天,还是早上四五点钟,我的行李已经提前一天办理了托运到长春的手续,在这个天还完全没有亮的早晨,为了保证万无一失,父亲用一辆老式28寸自行车驮着我离开我们当时已经在杭州半山的家,去到城站——杭州火车站,送我从那里出发,经上海转车,到我——也是他——梦想中的哲学系上学。我们一路聊着天,更多的并不是离别的愁绪,而是对未来的憧憬;不是由生活之艰辛所造成的怨怼,而是一种意气奋发、重新起航的豪情。我听到他弥散在未开晨雾中的带着兴奋思绪的声音,我只能看到(其实是紧贴着)他的背影和不时转过来的半张脸;至今二十六年过去了,他的整个面影和坚毅神情,越过时间的长河和岁月的沧桑,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我的面前。那么就让我用这个不成样子的“作品”献给父亲和我生命中那个永远定格的清晨,献给我生命中永远的父亲。

2010年12月3日

浙江大学港湾家园寓所

目 录

登小雅之堂——代序 /1

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因缘 /1

生活并不在别处 /10

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草中毕业三十年记 /18

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记我的老师范明生先生 /28

榜样的力量——叶秀山《美的哲学》重订本随感 /44

那难忘的岁月仿佛是无言之美——我读林庚及其他 /49

慷慨激昂之气，深沉郁勃之致——我读赵俪生 /59

我站在人群的外面——给贺卫方 /66

印象，论证，语境——我“读”陈嘉映 /69

从林毓生到佩迪特——我与严搏非的故事 /79

“风”“雅”“颂”——我和“法老”及其他 /85

未来的主人翁——在“我的朋友”徐向东教授讲座上的致辞 /90

阿隆《论自由》的政治思想史意义——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演 /93

康德、西季维克与两种自由——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纠谬 /108

倚杖听江声——我与伯林 /119

北归端恐待来生——我的未了“‘余’情” /130

津门纪行 /136

闪访南京 /145

三访北大 /152

贵阳破产记 /156

初见“小熊” /158

我的后半生(外三则) /161

“Massachusetts”和“天堂” /167

告别“魔都”，告别 STRAND /169

Life and Text /171

旋转木马 /175

我的部落格 /178

一个人的阅读史 /199

从“顽主”到“顽物”——淘书记四则 /204

从“跟不上时代”到“通三统” /212

解决——刘瑜“回来”了“什么的” /215

从南港到普林斯顿——比尔德《共和对话录》出版始末 /217

忘不了的人和事,才是真生命——读《巨流河》所想到的 /220

诗酒风流属老成——岁末逛枫林晚书店 /224

政治哲学译介之再出发——写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读本”之前 /230

夕阳西下的哀鸣,抑或一阳来复的期盼?——写在“共和译丛”之前
/234

“当代实践哲学译丛”总序 /240

从“语言学转向”到“实践理性转向” /243

从“西化”到“化西”——写在“公共哲学与政治思想丛刊”之前 /247

哲学、政治与文化的三重奏——“文化与政治译丛”总序 /252

摆荡在竞争与和解之间——《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编序 /257

《当代政治哲学名著导读》编者导言 /264

《第三种自由》编序 /268

《公民共和主义》编序 /274

我的文字生涯 /279

道思作颂——代跋 /315

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因缘

“走向一颗星”

——马丁·海德格尔：《从思的经验而来》

“朝向最明亮的光芒”

——彼得·斯特劳森：《我的哲学》

2006年2月20日，时近午夜，我来到久未光顾的“哲学在线”网站，一行触目惊心的黑体字映入我的眼帘：“著名英国哲学家斯特劳森教授逝世。”霎那间，我的脑子陷入了一片空白。定下神来后，我还看到了英文讣告和江怡教授的悼念文章，这才确信这位堪称当代圣哲的睿智老人已经永远离开了我们。老人已近米寿，在耄耋之年，传来这样的消息，虽不能说是绝对的意外，但却绝对让我感到怅然若失：在这早春未尽的寒意中，我仿佛感到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正从身上剥离下来，流失开去，与过去的时光一起一去不返了。然而生命的力量正在于它能够把已经消逝的过去重新放置到眼前，对之展开追忆和反思。正是凭借着这种力量，我的思绪回到了近十四年前。

1993年9月，在经历毕业留所未果、考博出现意外、求职无门等一系列折腾之后，我结束在淮海中路622弄7号三年的硕士学业，辗转来到杭州大学，投师我国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夏基松教授门下，攻读博士学位。入学后的第一要务就是确定学位论文选题。对于我这样一个大学入学专业是自然辩证法（后改称科学技术哲学），毕业论文做的却是魏晋玄学，硕士导师是希腊哲学专家，却以新儒学为硕士论文主题的并不循规蹈矩的学生来说，论文选题既是一件易事，又是一

件难事：易的是，我的求学经历表明——用我的老师范明生研究员的话来说——我“能够适应多方面的研究”；难的是，夏先生专治现代西哲，尤精科学主义。我的论文总要与老先生的方向沾点儿边吧。正在彷徨不定之际，我忽然想起，沪上求学期间，有一次曾在设在万航渡路的上海社科院图书馆借得一册斯特劳森的《个体》英文版，虽然就如同我在念硕士期间所借的所有外文书一样，这本绛红色封面、貌不惊人的平装书在我的小书架上放了一段时间之后不久就回到了图书馆的大书架上，但寥寥数页的阅读经验却就留下了极深的烙印：我直感到这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是一本探索人类的理智结构，却又对这种结构提出考验乃至挑战的纯哲学著作。于是我向夏先生提出，希望以斯特劳森哲学作为学位论文的主攻对象。夏先生的首肯使我接下来近三年的时光几乎都是在与斯特劳森的著作和与他有关的资料的伴随中度过的。

这里值得一记的是，与那时同在夏先生门下，以西方在世哲学家为研究对象的师兄师弟（那时既无师姐，也无师妹）一样，在收集资料的最初阶段，我们照例都是直接向作为传主的哲学家本人写信求助。所幸的是，我的求助也收到了效果：斯特劳森教授为我寄来了当时刚刚出版的《分析与形而上学》一书，这本书是根据他在牛津十余年和世界其他地区多次讲演（包括1988年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和牛津大学联合创办的中英暑期哲学学院的英方名誉院长在北京发表的讲演）整理而成的，副标题为“哲学导论”，表达的是他对于哲学的总体构想和理解。另外就是他的《普遍物》一文的抽印本，这是我与其他二手文献一起，列在要求他提供帮助的资料清单上的。我印象最深的是，斯特劳森在给我的信中，以大哲学家的口吻写道，在我的单子上的所有文章中，只有这篇是最为重要的。我自然要写信对他的帮助表示感谢，我还记得那年圣诞节给他寄去了一张贺卡，画面上是平湖秋月和宝石流霞的景致。值得一提的是，斯特劳森的学生格雷林博士也为我寄来了他的《哲学逻辑导论》和《驳怀疑论》，这两本书对我后来的写作也都有很大的帮助。

经过两年多艰苦的努力，我完成了题为《概念图式与形而上学——彼得·斯特劳森哲学引论》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学位论文，这篇论文着重“研究”了斯特劳森在形而上学、身心问题和先验论证方面的

思想。在勾勒了斯特劳森的哲学方法和哲学图像之后,分别从斯特劳森—罗素之争、斯特劳森—奎因之争、殊相的识别与本体论的优先性、经验的归属与人的概念、概念图式与先验论证五个方面较为全面地考察了斯特劳森哲学的成败得失及其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论文获得了评议专家的肯定并于1996年6月顺利通过了答辩程序。时隔近二十年,毕业前后的很多细节都已经淡忘了,只有夏先生在答辩会上说的一句话至今犹历历如在耳边:“小应最初要做这一题目,我还有些担心,现在看来,他的选择是对的。”

但说来惭愧的是,似乎半是由于命运的安排,半是由于我一贯的半途而废的做事风格(如果性格即命运,那么一切皆命),毕业从教以后,除了把学位论文分解成五篇论文发表在国内刊物上,我并没有机会继续从事斯特劳森哲学的研究,也辜负了我的老师孙月才先生希望我将来来到牛津在斯特劳森指导下从事研究的期望,更遑论向世界哲学高峰攀登和冲刺了,而是转到了表面看来与语言分析哲学不相干的领域,这时想起范师“小应能够适应多方面的研究”的话,竟有哭笑不得之感。

2000年初,我所在的单位计划在上海某出版社出版一套丛书,我的博士论文也被列入其中,并于同年底出版。正如我在那本书的“后记”中所写的那样,虽然我“喜新不厌旧”,对斯特劳森哲学一直并未忘情和释怀,但当时我显然没有能力从根本上提高我的论文水准,而只能就过去几年新出文献和相关进展作力所能及的修改和润色。修订过程中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材料有:斯特劳森为《斯特劳森的哲学》所写的《我的哲学》一文已经发表了,但由于时间紧张,我并没有找到这篇重要的文献,而只是就王路在《走进分析哲学》中的引用做了转引;斯特劳森接受江怡的访谈录也发表了,这篇访谈对理解他的思想颇有帮助。其他值得一提的工作还有:余纪元在牛津期间为江怡主编的《走向新世纪的西方哲学》撰写的《描述的形而上学:斯特劳森》,这篇文章对《个体》上半部的核心思想作了平实并又不失深度的评述;陈嘉映的《事物、事实、论证》对斯特劳森把事实排除在世界之外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虽然陈文没有全面考察斯特劳森的事物本体论,但他的批评和发挥仍然一如既往地让人兴味盎然;程炼的《先验论证》对包括斯特劳森在内的先验论证

思想做了颇有才情的解读和诠释。尽管我为论文的修订成书又作了一番努力,但遗憾的是,也许由于我的论文的核心内容早已经分篇发表并得到过一些评论,又或许由于我的“研究”确实并不到家,除了收到若干业余哲学工作者的“读后感”,这本小书似乎可以说从印刷机上下来的那天就已经死了。据我所知,对它的首次引述出现在江怡为他翻译的《个体》一书所撰的长篇译序以及他的巨著《西方哲学史·现代英美哲学卷》有关斯特劳森的一章中,这已是前年和去年的事了。但在我的个人的经历上颇有意义的是,在我修改这篇论文期间,同校的盛晓明教授正在撰写他的《话语规则与知识基础——语用学维度》一书,试图对他多年的康德研究和在日本东京大学从事知识论研究的心得做一综合的表述。晓明教授是一名先验论证迷,具有极高的哲学热情和超常的哲学洞察力,与他的聊天和讨论是我在浙大哲学圈(如果有这个“圈”的话)中最为难忘和激动人心的经历之一,我们也由此结下了“哲学的友谊”。

博士论文的出版似乎是我与斯特劳森哲学的真正告别仪式,虽然此后我也曾几度设想过翻译他的一两本书,但一直没有合适的机会。2004年初,我与友人打算一起编一本名为《第三种自由概念》(正式出版时改名为《第三种自由》)的译文集,计划对伯林以后自由观的进展作一番系统的梳理,我由此想到,斯特劳森曾写过《自由与怨恨》这篇针对“惊惶失措且混乱不堪的自由意志论的形而上学”的名文,便开始考虑可否把这篇文章翻译出来,收入文集。我征求了在写博士论文时就已经认识、其对斯特劳森哲学的精湛见解一直为我服膺的薛平先生的意见,并得到了他的热情支持,通过他在英的朋友传递消息(因老人不使用电脑),时隔十年,我又收到了已年届八五高龄的斯特劳森教授的亲笔信,授权我翻译并用中文发表《自由与怨恨》与《社会道德和个人理想》两文,令我感动不已。鉴于我一直以来对斯特劳森哲学文字的敬畏之情,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保证翻译质量,我又请薛平兄亲自操觚,而把自己的翻译尝试留给收入拟编的另一个文集《自由主义中立性及其批评者》的《社会道德和个人理想》一文。本打算兑现某位先贤的豪言:“此生写不出一本好书,就译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并在这两本译